

绪 论

国力论的若干假说

假说 A / 本书讨论的是转轨时期的国力。中国从 1978 年以来坚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来愈大，但双轨并存的阶段远未能结束，并轨的目标预期还很远，本书设定探讨的主项是转轨时期的国力，假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力处在超速增长期。

假说 B / 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向市场体制过渡，国家放权让利对直接的生产者提供有效的刺激，从而围绕着市场领域创造出新的机会格局，使分配的份额从高层的再分配向基层的市场分配转移，国力的发展会因为市场推力的作用而加快。在国力发展缓慢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制度层面上的宏观调控会提高国力发展的程度，而在计划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国力的充分发展只有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

假说 C / 本书的研究方法假设是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的“论域结合”。本书认定，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制度具有对个体的强制力，个体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变量。国力系统呈现基转趋势，国力的构成单一化，

其运行效能以基本满足个体生存需要为限；而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以放权让利为特点的制度合理松动与个体能量的激活，使国力系统的运行向效益最大化趋进，国力构成呈现多元化。

假说 D / 国力发展战略经历了“经济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三个阶段，目前正处在第二、第三阶段的过渡中。

假说 E / 国力系统本身是一个“场”，构成这个场的有诸多变量：权力场、文化场、经济场。每一个场都有自身的特点和追求的价值及行动的逻辑，它们之间的相关合力构成了“国力场”。

假说 F / 国力系统的运行是“成本投入—利益预期”的双向性来回运动的有机过程，国力系统的效益系数取决于成本投入减去利益预期的净值。

假说 G / 本书设定可以实现“国富民有”与“藏富于民”两种治国理论的调和，两者有着不同的合理“论域”。

假说 H / 本书设定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距中所拥有或控制的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所有力量的总和，由经济活动能力、政府行为能力、社会发展能力、资源能力、军事能力、民族凝聚力等能力组成，主要包括经济、科教、军事、外交、人口、资源以及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府权威和作为国力魂魄的民族精神等要素。

第一章

制度的强驱动力 与相对缓慢的国力增量

曾有一个美好的传说，阿里巴巴只要口念咒语“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装满金银财宝的山门便朝他打开。美好的传说反映了人民对于财富的向往。向往富裕、渴望强盛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振兴中华、强国富民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人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目标。1949年10月1日，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古老的东方冉冉升起，一个雄浑有力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豪情万丈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追梦之行。“光荣之路多荆棘”回顾共和国前30年的历程，走过的道路崎岖曲折，取得的成就堪称巨大，付出的代价却也极为惨重。在此世纪交替、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 1949~1978 年综合国力的增长实况

1.1 行路难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大约在公元 1700 年以前的若干世纪内，中国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生产率提高和财富创造等方面一直位居世界前列。遗憾的是，这种繁荣鼎盛的局面以及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并没有将中国导入现代化进程。当中国仍陶醉于农业社会的美妙时，西欧已经掀起了令世界震惊的工业革命，而中国在近代科技革命的历程中却变得无声无息，对于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快速发展机会也失之交臂。结果，西方世界借助于科技革命的成果实现了经济起飞，最终完成经济现代化，而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却由盛到衰，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

1800~1950 年是中国国力迅速下降的时期。日本在 1850 年前后的经济状况与中国大体相同，但在以后 100 年中，日本把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到 1800 年前后，多数欧洲国家在技术上都已超过中国，且在随后的 150 年中，技术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当欧洲人使用木犁种地时，中国农民使用的是铁犁；当欧洲人使用钢铁农具时，中国农民使用的仍是铁犁。

落后便要挨打，当欧洲逐步兴起与富强，并走上世界舞台中心之际，在列强进行殖民掠夺和抢劫的战争中，中国便长期沦为列强冲击和瓜分的对象。

及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已是一幅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国力水平极其低下。其时，中国社会同时并存原始生产工具到近代机器各种层次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而古老的中世纪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力中仍占优势。据统计：1949 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为 358 亿元，其中农业占 68.4% 工业占 12.6% 商业为 15.4%；在工农业总产值构成中 农业所占份额为 70% 工业为 30% 大机器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 农业、手工业占 83%。（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20~24 页。）工农业的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由于连年战争，遭受严重创伤（参见表 1—1），不仅大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及欠发达的印度。如表 1—1 1949 年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最高产量和 1949 年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最高年产量		1949 年产量	
		年份	产量	产量	占最高年产量 %
原煤	亿吨	1942	0.62	0.32	51.6
原油	万吨	1943	32.00	12.00	37.5
发电量	亿度	1941	60.0	43.0	71.7
钢	万吨	1943	92.3	15.8	17.1
生铁	万吨	1943	180.0	25.0	13.9
水泥	万吨	1942	229.0	66.0	28.8
平板玻璃	万标准箱	1941	129.0	108.0	83.7
硫酸	万吨	1942	18.0	4.0	22.2
烧碱	万吨	1941	1.2	1.5	125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1941	0.54	0.16	29.6
纱	万吨	1933	44.5	32.7	73.5
布	亿米	1936	27.9	18.9	67.7
火柴	万件	1937	860	672.0	78.1
原盐	万吨	1943	392	299.0	76.3
糖	万吨	1936	41.0	20.0	48.8
卷烟	万箱	1947	236.0	160.0	67.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249 页。

1950年印度的电力人均占有量是1949年中国的1.7倍，钢为1.3倍，棉布为2.75倍，中国的铁路1949年只有2.2万公里，而印度1914年就达到了5万公里。总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连年战争与灾荒，使得中国城市凋弊，失业成群，农村荒芜，交通崩溃，国力衰弱，社会经济破烂不堪。西方预言家断言：中共无法治理这个国家经济上的创伤，在军事上得100分的中共在经济上只能得0分。

社会主义新政权是在贫穷落后的而又饱受战争创伤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迅速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增强国力，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便成为新政权面临的急迫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依靠热情高涨、对新生活无限憧憬和渴望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新政权在战后重建与恢复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效率。到1952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大大高于1949年，而且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见表1—2）。

表 1—2 1952年中国的经济水平

	1949年	1952年	增长倍数	年增长率
社会总产值	557亿元	1015亿元	2	30%
工业总产值	142亿元	349亿元	2.45	34.8%
农业总产值	326亿元	461亿元	1.41	15.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4》。

1952年钢产量达到135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2.7万吨，原煤0.66亿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0.04亿吨；发电量73亿度，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3亿度，水泥28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57万吨，棉花130.4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5.5万吨，铁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增长11.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3年增加了17.6%。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

的恢复与发展，也促进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此外，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都有了较大发展。经济恢复工作的胜利完成，为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逐步增强国力奠定了基础。

但是，由于新中国底子薄、基础差，尽管工农业生产恢复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的发展水平仍然远低于1930年前后苏联和日本的水平，甚至也比不上当时的印度，尽管它的农业产量比较高（参见表1—3）。

表 1—3 1952 年中国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

比较项目	苏联/1928年 前后	日本/1936年 前后	印度/1950年	中国/1952年
GNP(百万/1952年 美元水平)	35000	22600	22000	30000
人均 GNP(1952年 美元)	240	325	60	50
人口(百万)	147	69	358	575
出生率(‰)	44	31	38	37
死亡率(‰)	20	18	24	17
每英亩耕地养活 人口数	0.20	1.6	0.6	1.9
水稻产量(吨/公顷)	2.2	3.6	1.3	2.5
小麦产量(吨/公顷)	0.8	1.9	0.7	1.1
按人口平均的 工业产量				
煤(公斤)	273	604	97	96
生铁(公斤)	22	29	5	2.8
粗钢(公斤)	29		4	2
电力(千瓦)	0.01	0.10	0.01	0.005
棉纺锭子(个)	0.05	0.17	0.03	0.0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报告：《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26 页。

现代化是 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的百年梦想。然而，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依然是传统的农耕经济，现代工业好像浩瀚荒原上的几棵小草。新中国就在这样一个现代工业极不发达、农业经济十分脆弱的基础上，真正拉开了现代化的帷幕，踏上了由弱变强的崛起之路。

1.2 选择艰途

1953~1957 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发电、采矿、石油、钢铁、有色金属、重型机械等大批新型工业，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增强（见表 1—4）。

表 1—4 “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总产值(亿元)	国民收入(亿元)	人均国民收入(元)	工业总产值(亿元)	轻工业总产值(亿元)	重工业总产值(亿元)	农业总产值(亿元)
1952 年	1015	589	103	349	225	124	461
1953 年	1205	672	114	455	285	170	475
1957 年	1735	901	139	798	412	386	575
年均增长%	11.3	8.9	6.2	18.0	12.9	25.4	4.5

注 各项指标的绝对量皆以 1952 年为基础的同比增长指数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32~77 页。

“一五”期间由于大规模进行工业建设，大批新建和扩建企业投入生产，使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1957 年同 1952 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为生铁 401 万吨，钢 400

万吨 原煤 0.65 亿吨,发电量 120 亿度 原油 102 万吨,水泥 400 万吨 金属切削机床 1.43 万台 载重汽车 3 万辆。在农业生产方面 粮食 1957 年为 1950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9% 棉花 1957 年为 164 万吨 比 1952 年增长 26%。各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极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能力。

“一五”时期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重工业的超常发展,极大提高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表 1—5 表明,“一五”计划完成后 在中国已形成了工业部门占优势的新的产业结构,从而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表 1—5 一五时期的产业结构 (%)

	社会总产值	农 业	工 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 业
1949 年	100	58.6	25.1	0.7	3.4	12.2
1952 年	100	45.4	34.4	5.6	3.5	11.1
1957 年	100	33.5	43.8	7.4	3.7	11.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版。

与工农业发展并肩而行的是交通运输业。5 年内 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等共约 1 万多公里,使我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2.67 万公里 比 1952 年增加 16.6%。1957 年底 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5.46 万公里 比 1952 年增加 1 倍 内河航运里程达到 14.41 万公里 比 1952 年增长 51.7% 空运线路达到 2.64 万公里 比 1952 年增长 1.02 倍。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便利了物资交流,促进了国际国内贸易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的经济活动能力。

此外，“一五”期间我国的文教卫生状况也有较大改善。5年内医疗预防网迅速扩大，1957年全国各医院已有病床位29.5万张，比1952年增长84%。1957年我国平均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而1949年时每万人口中只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小学生450人。

总之，经过5年发展，共和国的综合国力在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政府领导能力以及国际活动能力等方面得到较大增强。尽管中国的国力水平依然较低，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但一个自立自强的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但是，由于综合国力的各种构成要素的非协调发展，制约了国力的持续发展能力，为中国国力的后续增强留下了严重的隐患。(1)经济结构缺乏协调。“一五”时期，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之比是1:4，农轻重增长速度之比是1:2.9:5.6，轻重工业增长速度之比为1:2。重工业一枝独秀，支撑着高高上扬的 growth 曲线，农业部门严重落后。农业的不发展，造成轻工业原材料的短缺，开工不足，生产能力无以充分发挥。据统计，1957年由于原材料不足，纺织业的开工率是85%，制糖业是66%，榨油业是75%，面粉业是68%。(2)工业发展的资本密集型取向，严重减弱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阻碍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经济的转轨。“一五”时期，工农业劳动者人数增加2148万人，其中工业增加155万人，仅占7.2%，农业增加1993万人，占92.8%。中国的工业化不能为劳动力提供愈益扩大的就业机会，失业、半失业问题加深。（罗德明：《中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55年版，第34页。）(3)社会凝聚力趋于下降。迅速的工业化产生的政治精英集团和技术精英集团以各自擅长的领域为基础，行使日益扩大的正式控制权，他们有

着脱离工人和农民的倾向；迅速的工业化带动城市经济日新月异 农村经济则发展缓慢 逐步拉大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1955年供给制被废除，代之以苏联式的复杂的行政干部等级制，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人们遵循的更多的是物质利益原则 革命热情和理想有所淡化 社会亲和力下降。(4)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新中国在诞生时就继承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一五”时期又以 2.2% 的年增长率快速膨胀。对于一个贫穷落后而又拥有较高的人口土地比例的国家来说，巨大的人口规模显然是一种沉重的历史负担，将对发展构成极大的障碍。

人口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能是财富 也可能是负担。中国的人口问题自清代中叶乾隆时期已相当严重，诚如外国学者所言，“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口过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一个伟大帝国疲惫地倒在尘土之中。中国 这个世界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 1957年，马寅初先生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控制人口建议 主张“两个有奖 三个有税 以税做奖”。而毛泽东则豪迈地宣布：“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好事”，“世界一切事物中 人是最可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解放初期 中国人口数为 54167 万人，1957 年增至 64653 万人，8 年净增 10486 万人。而到 1975 年 全国人口数为 91970 万人，9 年净增 27317 万人。人多力量大 至今日 逾 12 亿之巨的人口重重地压在这片狭小的黄土地上。人口众多，素质低下 成为过去、现在、将来中国发展的最大包袱 历史在叩问 何以造成这中华民族的世纪悲剧？！

1.3 “蹦极”跳跃

1958年至196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时期。1958年下半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不断的反“右倾保守”为其开辟了道路，经历了运动初期的酝酿发动，1958年秋季和1960年上半年两次“全民大办一切”事业的群众运动高潮，前后延续两年多的时间。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是为“跃进”口号的出笼。1957年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力争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中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又提出：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1958年5月，毛泽东提出：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10年赶上美国。6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宣布：中国3年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958年8月17日，在风景如画的北戴河，毛泽东庄严宣布：“过渡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并决定：钢铁元帅升帐，全民大炼钢铁1070万吨；苦战3个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年轻的一代中国人再次聆听到了他那充满巨大激情的湘南口音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鸣：关于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要和苏联“对表”，苏联是老大哥，让他一下，他上午挂共产主义的牌子，我们下午挂共产主义的牌子。自此，一个全民的“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

中国大地迅速掀起。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由于整个社会运转以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为重心，政府动员空前大规模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经济建设，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相互支援，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就：(1)“二五”时期（1958~1962年）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比“一五”时期的492.18亿元增长75.1%，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完成的；从建国到1964年所建设的大中型工业项目中，2/3以上的项目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2)1958~1960年新增生产能力占1950~1979年新增生产能力的比重：炼钢为36.2%，炼铁为32.7%，采煤为29.6%，棉纺锭为25.9%，足见这一时期确实形成了大批新的生产能力。(3)最具重要意义的是原子尖端技术开始突破，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成和试爆打下了技术基础；大庆油田艰苦创业，使中国原油产量由1957年的146万吨增加到1960年的520万吨，增长2.56倍。(4)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然而，与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三年跃进所取得的成绩则显得十分微小，收益扣除成本所得到的只能是“黑色”的负数。

(1)粮食产量及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粮食产量1958年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再降到2870亿斤，1960年的产量甚至低于1951年的水平，比1957年减少了26.4%。猪的存栏数1960年为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了近一半。棉花1958年为196.9万吨，1960年下降为106.3万

吨,下降 46%。油料 1958 年为 477 万吨,1960 年下降为 194.1 万吨,下降 59%。在此期间,全国人口由 1957 年的 64653 万人增加到 1960 年的 66207 万人,而同期国家粮食库存减少约 230 多亿斤,按每人每年需要粮食 500 斤计算,国家一年大约缺少 2400 万人的粮食。农业大国的基础岌岌可危。(2)重工业内部及农轻重三者之间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结构偏差进一步加大。1958~1960 年重工业增长了 2.33 倍,轻工业只增长了 47%,农业却下降了 22.7%。(注:本处资料皆出自《中国统计年鉴 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158~160、178 页。)在工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 1957 年的 43.3% 猛降到 1960 年的 21.9% 轻工业从 31.2% 降至 26.1% 重工业从 25.5% 猛升为 51.1%。“一五”时期潜伏的结构断层经“跃进”期间“钢帅”及重工业的单兵突进已被拉大到足以使社会经济崩溃的状态。(3)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绩效与微观绩效严重背离。“大跃进”期间积累率由“一五”时期平均 24.2% 的水平提高到 1958 年的 33.9%,1959 年的 43.8%,1960 年的 39.6%。这 3 年积累总额达到 1438 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 44%。庞大社会资源被用于“大办”钢铁“大办”一切,必然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平均每人消费量的下降幅度:粮食全国为 19.4%,其中城镇为 1.7%、农村为 23.7%;猪肉全国为 69.9%,其中城镇为 69.8%、农村为 72%。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低水平。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增加,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人口死亡率,从 1957 年的 10.8‰ 上升到 1958 年和 1959 年的 11.98‰ 和 14.59‰,1960 年陡升至 25.43‰,竟比 1949 年的 20‰ 还高 5.43‰。该年全国人口净减 1000 万!社会主义好,肚子吃不饱!”

现实是残酷的，“一天等于二十年 跃进再跃进”共和国并未因此而跃入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历史的差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抹平 剧起之后是骤落 不顾实际的‘跳跃’终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表 1—6 显示出“大跃进”导致的大衰退直到 1965 年才基本恢复。从某种程度说，“大跃进”至少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了 7 年。

表 1—6 1957~1965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

项 目 年 份	社会总产 值(亿元)	国民收入 (亿元)	人均国民 收入(元)	工业总产 值(亿元)	轻工业总 产值(亿元)	重工业总 产值(亿元)	农业总产 值(亿元)
1952	1015	589	103	349	225	124	461
1957	1735	901	139	798	412	386	575
1958	2300	1100	167	1235	551	684	589
1959	2714	1190	177	1682	673	1009	509
1960	2840	1173	177	1870	606	1264	444
1961	1890	825	125	1155	475	680	434
1962	1700	771	115	963	435	528	461
1963	1874	854	124	1045	446	599	514
1964	2202	994	141	1250	525	725	584
1965	262	1163	160	1580	775	805	632
年均增长%							
1958~1960	17.9	9.2	8.4	32.8	13.7	49.3	-8.2
1961~1965	-1.6	-0.2	-2.0	-3.3	5.0	-8.9	7.3

注 各项指标的绝对量以 1952 年的可比增长指数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2~77 页。

“大跃进”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灾难 加之农业生产连续 3 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各种不利因素风云际会 中国社会经济于 60 年代初期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被迫于 1961~1965 年进行了艰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以挽救中国社会经济。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回全部苏联在华专家 撕毁合同 ;7月25日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 1390人 撤回 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 废除 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中断当时在建的 201项援建项目,并停止所有物资设备的供应。苏联政府的此种做法,扰乱了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工作,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社会主义大家庭瓦解,中国在国际上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经过 1961年至1965年整整5年的艰苦努力,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社会经济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 参见表1-6)。

1964年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

(1)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农业产量成倍增加。据统计到1965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2倍。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同1957年相比 原油开采增长6.5倍,原煤开采增长74%,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增长2.25倍 炼铁增长69% 炼钢增长1倍 水泥增长1.38倍 棉纺锭增长29%。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工业产品产量也增加较快 同1957年相比 钢产量增长1.28倍 煤炭0.77倍 发电量2.5倍 原油6.75倍 水泥1.38倍 棉纱0.54倍。到1965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1957 年的 165 万马力提高到 1494 万马力提高了 9.05 倍 化肥施用量由 1957 年的 7.3 万吨提高到 194.2 万吨 提高了 5.2 倍。196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19453 万吨 比 1960 年的 14350 万吨增产 5105 万吨,接近 1957 年的 19505 万吨水平 棉花总产量 209.8 万吨 比 1957 年增产 27%。

(2)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 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 初步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据统计,主要工业产品品种在调整的 5 年中增加了 3 万多种 新兴的石油化工工业、原子能工业、导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部门。综合国力发生了巨大质变。

(3)结构偏差有所矫正,经济协调力增强。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 1960 年的 4:1 调整为 1965 年的 2:1 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从 1960 的 33:67 提高到 1965 年的 51:49。

(4)交通运输邮电事业迅猛发展。1965 年与 1957 年相比,铁路货运量增加了 76%,邮路总长度增加了 57% 电报电路总数增加了 41% 长途电话总线路增加了 111%。铁路运输已达除西藏以外各省、自治区,通信网路已延伸到广大农村,社会整合力大大增强。

(5)教育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科技能力大大提高。1964 年核爆炸试验成功,集中反映了我国科技能力的增强。

(6)国防能力增强,国际活动空间拓宽,中华民族生存能力极大提高。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的消费基本实现自给,核爆炸实验成功以及原子能工业、导弹工业的发展对于保证我国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经济、加强国防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同时,“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转向更为平衡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同西